

新評論

半月刊



第二期

目錄

- 論中國外交政策……………周子亞
- 沒有國書的使節……………沈昌煥
- 歐洲的墓碑……………許汝祉
- 論米內內閣……………金長佑
- 美日交涉中的幾個要點……………郭斌佳
- 日本之現勢及其前途……………楊玉清
- 漫談生死(散文)……………袁昌英
- 編輯後記……………編者

【本刊每期零售一角】
 【半年連郵一元二角】
 【全年連郵二元三角】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五日出版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號

編輯出版者
 新評論社
 重慶來龍巷三六號

本期文字由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雜字第一三六六號審查證

新 評 論

半月刊



創刊號

目 錄

- 強國的開端……………儲安平
- 縮小省區的具體方案……………胡煥庸
- 論歐戰中之外交戰……………周子亞
- 論歐戰中之經濟戰……………陳鍾浩
- 論歐戰中之宣傳戰……………王一之
- 歐戰對於日本經濟之影響……………劉燕谷
- 編輯後云……………編者

論 中國 外交 政策

周子亞

(一)

八一三全面抗戰的開始，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大轉變，自此以後，中國外交有了運用的據點；簡言之，以日本為攻擊對象的外交活動可在彼時開始。

提起反日外交，我們不能忘記了歷史上的一位出色人物，這個人物就是李鴻章。他曾親自跑到日本與伊藤博文訂立馬關條約，也曾以賀壽為名，秘密前赴俄京與帝俄政府簽訂中俄反日同盟。能夠看清日本是中國唯一大患，企圖以國際友邦之力來孤立日本在遠東的活動，並遏止其侵華之野心者。有清一代，只有李鴻章一人，雖其政策沒有具體實現，但其見解之真確與魄力之雄厚，却使我們後輩不能不肅然起敬。

反日是李氏終身的一貫主張，「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知我虛實，誠為中國永久大患，今雖勉強就範，而其深心積慮，覬覦我物產人民之豐盛，冀俾我兵器利器之未齊，將來稍予間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鐵甲船水砲台等項誠不可不趕緊籌備」。遠在中日甲午之役以前，李氏早已有這種遠見。琉球問題發生，朝廷中人如張之洞等極力主張接受日本平分琉球羣島的建議，用全力來應付對俄的伊犁交涉，獨有李鴻章一人，挺身反對。他有幾句很精

彩的話：「與其讓於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於倭而又將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倭。」甲午之役以後，李氏看到日本新興勢力的可怕，所以毅然決然跑到俄京，商議中俄同盟來對付日本。「稍讓於俄，借俄懾倭」，正是李氏反日政策的第一個具體的表現。

當日強鄰環伺，中國的國際關係十分險惡，但是李氏以為中國的真正敵人只是日本，主張對於西洋諸國稍稍讓步。一八八四年朝鮮有甲申之變，越南問題亦在同時發生，諒山之役，中國大勝，朝廷中人都主張放棄朝鮮問題，以全力來與法國周旋，唯獨李氏以為朝鮮比越南更重要，而法國為患決不及日本兇狠。所以他在上總理衙門書中切切指陳：「朝人生心，日人播弄，皆由法事而起，若法兵早解，我軍不再挫損，可冀銷鎗隱患，否則事勢變遷所極，真有不堪設想者！」「環顧大局實增備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是李氏反日政策的第二個具體表現。

可惜當時中國的國力準備，配不上李氏的國防外交，所以甲午之役以後，李氏的反日政策，由主動而淪為被動，及至日俄戰後，聯俄亦不可能，於是中國的外交從那時起，走上了徬徨無所依據之路。

(二)

李氏沒後，中國的國際環境日趨惡劣，各國相繼在中國要求勢力範圍，而朝廷中人也沒有眼光能如李鴻章者出來主持對外交涉，所以直利清社覆沒，清代外交沒有明朗之日。

民國成立，國家面目煥然一新，對外國關係本來可期有一轉變，但執掌外交者，因只注意於支節的應付，故對於政策的確立，仍遲遲未有決定。

歐戰前後的國際環境，固然對於中國十分不利，但從巴黎和會起，中國對外國關係，要是能確立起「敵對」和「聯絡」的對象，至少不至於造成今日日本橫行遠東的局面。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有傑出的進外交人才，亦有很利於中國的國際環境，不過政府事先毫無佈置，以至山東問題，本可有利於華者，反而變成有利於日。在那個時期，美國藉其歐戰勝利之餘威，對於遠東局勢，頗想有一調整，但因日英同盟無法拆散，英美對抗逐漸形成，美國的積極反日政策，沒法付之實施，不得不來一個與英日妥協的華府會議，以安定遠東於一時。當時我國政府對於這種複雜的國際關係，不知善用自利。美國既能出來為我國打抱不平，而英日同盟關係，復因美國的活動及英屬地的反對而拆散，國際環境正是十分有利於我們，若在此時我們能夠確立起明顯的反日外交，積極拉攏美國，在九國公約尊重中國的獨立原則上面，織成一個迫使日本不敢妄動的外交網，則其後日善復交，所謂石井藍辛協定，所謂日本在華特殊勢力範圍，決不至成爲事實。

民國十四五年，國民革命軍興起，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要

求，一時成爲反帝國主義的先聲。廣州和武漢時代，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其影響甚大。當時執掌外交者，頗能以新的交涉姿態，爲「家樹立新」的外交關係，比如濶用領事裁判權的矯正，租界行政權的收回，外人觀審權的限制，頗有成效可觀。可惜這種革命外交，不能與國力配稱，而且內部的未能真正統一，更使這種革命外交的運用發生極大障礙。今日抗英，明日仇法，終至列強皆成中國敵人，而爲中國真正敵人的日本，反而漁翁得利，有機可乘。此時中國外交，可算是有政策時期，但是政策的運用沒有技術爲其掩護，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終如曇花一現，毫無結果。

(二)

以全恃列強爲交涉對手的中國外交政策，反而緩和了日本在國際間孤立的窘態，從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三〇年止，日本在遠東的活動，表面上看去，似乎比較緩和，實際上他在東三省的侵略行爲，因爲取得了英美的諒解以後，暗中十分積極。我國政府對於這種國際形勢的轉變，事後毫無措置，反而以爲日本態度轉和，中國可以相安一時，對外關係也不積極設法推展，除了支節的交涉以外，根本無外交可言。

孰知幣原的緩和外交，正是日本侵華的一個幌子，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突如其來的在遠東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的獍獠面目完全暴露，不過當時英美對於遠東政策不能調和的形勢業已造成，蘇俄雖然痛恨日本行爲，亦是愛莫能助，其他列強在遠東的力量和利益，根本不能與日本頡頏，我國外交臨時慌忙，因不得不上毫無辦法的國聯路線。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侵佔東三省，其間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經宣佈不承認主義，痛斥日本的非法行動，其他列強亦為正義所動，蓋與日本為伍；此時日本的孤立形勢又復形成。但是我國政府始終迷信國際聯盟是解除中日糾紛的唯一救星，不選擇與日本有根本利害衝突的國家來作外交上搦手的對象，坐使日本在遠東的勢力日益膨大，造成了別國不敢再理中日糾紛的惡劣局面。

國聯路線顯告失敗，軍事上又尚未到與日本為敵的時間，必然地只有走向直接交涉的一途。日本當局也企圖以不戰而勝的野心，與中國作一次最後談判，在中日外交史上佔重要一頁的川樾張學良談判，繼一九三五年一月廣用三原則的宣佈在南京舉行。當時我外交當局對於日本無理要求，一一據理力駁，極盡能事；自從民元以來對日辦理外交，此次可謂是唯一的成功。但是直接交涉之於當時，決不能代替我們的基本外交政策，其稍強於走國際路線者，只是因其比較具體。要是日本能夠覺悟，那時中日關係或許可有調整希望，反之，中國只有被迫而走上抗戰路線。

一九三五年的中日直接交涉，是八一三全面抗戰的一個端倪。從此以後，日本企圖以外交戰勝中國的迷夢完全覺醒，而中國也逐漸被迫而放棄國聯調解的期望，走上反日外交的新路綫。

(四)

前已言之，八一三全面抗戰，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大轉變，但是檢討兩年來我們對外活動，始終尚未看見反日外交

建立的雛形，換言之，我們外交的活動，尚不能促進軍事的成功。

怎樣建立反日外交，這是本文所要解答的主題。外交上有一攻擊的目標，必須有一搦手的對象，有了這兩個據點，一切的活動才可開始。日本是中國外交唯一的攻擊目標，但是我們搦手的對象是那國？這是首先須要確定的。

分析目前遠東的國際關係，與中國抗戰有深切之利害關係而尚有餘力與日本周旋對抗者，只有美國與蘇聯。英國在遠東的利益，並不下於美俄，但是英國歷來寬容舉行的政策，已經使他失去了支配世界政局的領導地位，所以我們對於英國只能認為友邦，不能希冀過奢。美國的情勢與英國大不相同。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並不大於英國多少，但其關心中日問題，尤其對於暴日非法行為的責難，百倍於英國。美國遣股新興力量，確為日本所畏懼，觀乎前次美國毅然廢止美日商約，以及此次日本極力討好美國就可見一斑。可惜美國的超然中立，已經成為他的傳統國策。在某個時機，她或許會出來替中國主持正義，替遠東局勢重建和平，但在戰爭的進程中，美國當不致於捲入戰爭漩渦，來和暴日作正面衝突。所以對美外交，我們固然可以大大運用，但其成果是在戰後而不在戰時。

剩下來只有蘇俄一國，蘇俄對於日本的侵華行為，過去雖無明顯的表示，但其朝野人士對於我國英勇抗戰，莫不表示深切同情，而且日本侵華大陸政策的成功直接危害蘇俄國家的安全。遠在四十年前，俄國駐華公使曾對李鴻章說：

「日本外交的對象，不是中土而是俄國，蘇俄人士對於日俄世仇，當必因此次日本侵華而益為深刻。不過蘇俄目前正在建設時期，不能急急報復此恨，所以幫助中國抗戰勝利以免造成日俄正面衝突的形勢者，當為蘇俄朝野人士所樂為。俄國既然有這個心理，而我國也有這種要求，借俄僑倭，歷史重演，談到今日外交上播手的對象，第一個當然是俄國了。」

(五)

不過在實行以聯俄為據點的反日外交政策時，不能不注意幾個問題：第一，要造成一個有利於聯俄的中國國際環境；第二，要注意到聯俄外交的藝術運用；第三，最為重要的，要織成一個與聯俄相輔而行的網線外交，用以確立起中國在世界的獨立自主地位。這三點互有密切聯帶關係，茲再伸論於後。

從遠東國際關係上說，日本是一個足以引起國際忌惡的反動勢力，而俄國在歷史上亦復為然。蘇俄雖曾變易國體，但是英美對他的惡感，並不下於帝俄和暴日，所以已往對於蘇聯表示好感的國家，英美對他不免也有幾分仇意（戰後的德國即一明例）。在這種複雜的國際形勢之中，中國要積極聯俄，必得要獲取英美的諒解，在英美可以同意的條件和限度下與蘇聯合作，此其一。英俄主要的衝突，不在遠東而在近東，美俄的基本齟齬，不在經濟而在政治，所以牽涉到近東和政治問題時，中國不可表示意見，此其二。英俄美俄對於遠東問題意見不能一致，中國應該設法積極拉攏，務使這三國在遠東的步趨不發生衝突，由不衝突而進於同調，則日

本的侵略氣焰，必可大戢，此其三。這三點能夠做到，則於聯俄有利的國際環境，也必然形成了。

有了有利於聯俄的國際環境，就要注意到聯俄的分寸與限度。第一，「聯俄」必須與「對共」分開；聯俄是外交關係，對共是內部問題。為了達到以聯俄為主幹的反日外交的成功，我們可以容許共產黨加入抗戰陣線，為民族獨立而共同奮鬥，其次，聯俄外交，應該多偏重於經濟外交，我們不妨以極大的物質代價，來換取蘇俄的經濟援助，但因這些援助而要犧牲到我們政體的自由時，我們應該懸崖勒馬，有所攷量。萬一蘇俄也有決心對日本作軍事行動時，我們亦可與之締結同盟，不過這個假定的同盟，必須要互惠的，必須要有有限度的，其範圍最好限於經濟方面，不可及於政治關係。能夠確實守住上述三點，那麼聯俄外交，可說有一半是成功了。

為了避免聯俄而引起國際的反感，或者因聯俄而被迫走上危險的道路，我們應該在這個據點以外，同時分織網線，聯絡英美法意德等與遠東有利害關係諸國，借其助力以補萬一。其實據點外交與網線外交，在有利於聯俄的國際環境下本可相輔而行。據點外交可使暴日增加一個威脅力量，而網線外交則可形成暴日的孤立形勢。從前俾士麥聯奧以敗丹，聯法以敗奧，其後又聯奧以敗法，是據點外交；後來法國聯英聯俄乃至聯意以敵德，是網線外交。我們對付暴日必須雙管齊下，方可一舉兩得。至於如何聯美聯英法乃至聯意聯德，乃是技術問題。只要確立起以聯俄為據點的反日外交，就

不難分別進行，以助其後。

總之，外交有策有略，政略可隨而變更，政策則至少在一時期中必須一貫。目前是抗戰時期，我們的敵人只有日本帝國主義。如藉藉國際壓力來減輕暴日的侵略行動，是這個

沒有國書的使節

有人把旅居國外的僑民比作沒有國書的使節 (Ambassadors without credentials)，我們認為這種比喻至為確當。因為僑民在國外的一舉一動，文化程度的高下，經濟力量的強弱，都是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最具體的表現，他們的成功或失敗，祖國在外的地位隨之而升降。

這種沒有國書的使節，自數量言，恐怕除了沒有祖國的猶太民族外，以吾國為最多，吾國華僑人數約計在一千萬以上，比較小國的全人口尚超過幾倍。自分佈的地域言，凡文明人類所至之地，無不有華僑的足跡，甚至當地土著尚不勝其熱的南非洲，也有華僑辛勤奮鬥的史實。英人嘗以「帝國無日落」自誇，吾國「無處無華僑」也可以自豪。

近年以來，吾國朝野對於國際宣傳較前重視，國民外交的活動亦驟見踴躍。報章雜誌上充滿了討論國際外交問題的文章，推行國民外交的團體，在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滋長出來；這些都足以反映國民對於外交興趣的日益濃厚。抗戰以後，國民外交代表的派遣，有關文化學術或宗教等國際會議的

階段中我們的主要外交工作句要完成這個工作，必須有一政策。「借俄僑債」雖然一句實話，但其見解之真確，至今尚可用，要完成抗戰，我們非確立起這個政策不可。

沈昌煥

參加，也很積極。凡此種種努力，自然都是進步的現象。但是我們絕對不可以此自滿，若是細細的檢討，我們應做而未做的事，不知尚有多少！試問我們有一千數百萬位「沒有國書的使節」分駐世界各處，無論在經濟上，外交上都是何等偉大的力量，可是我們有沒有把他們的潛力發揮出來？

以經濟而論：在過去，總理歷次發動革命，幾乎全賴華僑捐款為策動的經費；吾國對外貿易，始終處於入超的地位，多少年來國際支付上，又全賴華僑的匯款為挹注。抗戰以來，各地僑胞捐款贖債的數目，已超過數萬萬元，目前還在源源不絕的踴躍輸將。將來抗戰勝利，我們更需要僑胞運用其雄厚的經濟力，投資內地，開發富源，合力共建新中國。

以外交而論：代表政府的外交官或偶而派遣的國民外交代表，人數畢竟有限，自然不若華僑那般深入民間，與居住國社會有比較深切普遍的接觸。外交官代表政府，因有責任的拘束，發言常受技術上的限制與政治上的顧慮，聽者明知外交官總是站在本國立場上向外宣傳，在未聽之前，即存一

勿中宣傳的戒心。僑民與居住國人民往還，既不受責任上的限制，日子常生活中，在不知不覺間，反而容易影響外人對我們國家的態度。況且，紙面的宣傳，口頭的辭令，僅能留下抽象的意識，僑民在外實際生活的情況，却是具體的事實具體的事實所給他人的印象，常較抽象的意識給他人的印象更為深刻。

抗戰已入第四年，華僑擁護抗戰的熱忱，捐款購債的踴躍，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他們爲了祖國奔走呼號，激動了全世界人士的無限同情。可是，我們細味此種同情中所含的成分，總覺得憐惜多於敬長。此中最大的原因是在國內的同胞平日太不注意華僑問題，未曾盡最大的努力幫助華僑，提高其文化水準，加強其組織力量，擴展其經濟勢力，以致華僑在實際生活上，未能使外人生肅然起敬之心。我們深信僑胞貢獻於祖國的力量，不止於此，只是我們不曾認識此種力量的偉大，尙未將它的潛力發揮盡致而已！

試觀今日華僑在國外的情形，誰也不能否認仍處於自生自滅無人過問的狀態之下。文化水準之低，舉一學即可證明：唐人街上不易找到一家比較完全的書店，雜貨舖中寄售的書本，大率是些「鄉下人遊記」「金瓶梅」一種趣味低級的舊小說，有關抗戰建國，激發民族意識或介紹祖國現狀的書報，反而不能購得。生活方式，大都是既守舊，又不清潔，唐人街往往被視爲滑稽神秘的地域。以職業論，除了在南洋極少數的高僑而外，多數以洗衣飯館及小販爲業，因此就很少和居留地上流社會相往還的機會。上述種種現象，僑胞

本身不足深責，因爲他們在出國以前，大都未受高深教育，旅外既久，對國內情形不免隔膜。他們在外人種族歧視政令壓迫之下，含辛茹苦，勤勤奮鬥的精神，我們唯有表示同情與敬佩而已。

我們認爲多少年來華僑力量的未得發動，至少有三種原因：第一，增進僑民福利，本是外交官應有的職責，可惜許多外交官都抱無爲而治的態度。筆者留學國外時，嘗與吾國駐某地地總領事論華僑問題，他坦直他表示：華僑中派別各立，若抱「無爲而治」的態度，尙能相安無事，倘欲有所改善，則動輒得咎，反受攻擊，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有一次謁見吾國駐外某大使，力言應發動留學生勸誘僑胞改善生活並推行國民外交爲國際宣傳之助。大使的議論猶在耳邊，他說：「Many people who want to speak do not know what to speak. They antagonize people instead of making friends」。所以，他認爲留學生沒有爲祖國作對外宣傳或援助華僑的必要。自然，外交官中，並不是沒有熱心僑務，努力國際宣傳的人，可惜這樣積極振作的實在太少了。第二、吾國曾經留學外洋的留學生，總計何止十萬；抗戰以前每年陸續放洋的，公私費生，爲數甚夥，分佈各國，少則數百，多至數千。他們大半是國內大學畢業的優秀份子，倘使這一羣青年人，對於華僑問題，有清楚的認識，肯分一部署業的時間，與僑胞多多接近，傳播有關祖國的消息，勸誘他們改進生活的習慣，那末僑務的問題也絕對不致演成今日的地步。實際上，僑胞對於祖國的一切，萬分關心，每回留學生抵

埠，僑胞熱烈款待，親如家人，聞祖國多難，則疾首蹙額，聞祖國進步，則歡欣鼓舞。而且僑胞都渴望學習「國語」，他們常因缺乏經費，不能聘到國語教習，引為憾事。偶有一二留學生願意抽暇去教授國語或講演國內近況的，僑胞無不感激涕零。可惜熱心的份子太少，大多數的都是漠不關心。有的甚至因為華僑在國外的職業低微，生活習慣不良，反而對他們生一種鄙棄之感。在學生時代已抱如此心理，歸國從政後不能為僑胞造福，乃意料中事。第三，政府派赴歐美政察的大員，每年都有，僑務應加改善，是顯而易見的事，可是，出國常是酬庸失意者的禮品，考察已成遊覽的別名，僑務之不得改進，概然如故。

徒然追悔已往的錯失，無裨實益。今日是我們集中一切力量爭取生存的時候，千餘萬僑胞的實力，不容長被湮沒。僅願提出幾項具體的建議，貢獻給有關當局的掙納。這些辦法，祇須就現有機構上加以努力，能否見諸實施，是「為不為」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

(一)由主管僑務、外交、教育、及宣傳的機關，共同研究審訂適合於各地僑胞程度的各種讀物及圖畫；並須編印外國語的讀物，以供在外出生不諳國文的僑胞之用。以後經

歐 州 的 墓 碑

歐洲大陸上有一塊墓碑，植在秀麗明媚的萊芒湖畔，也植在千萬人的心上，墓碑上刻着四個字：「二十而夭。」

常有一種關負責，供給僑胞有關國內重要問題的消息，及適合於當地環境的宣傳大綱。因為僑胞對國內的情況愈清楚，則愛國的情緒愈濃厚，對外的步調愈一致，則宣傳上的效力愈宏大。以上書報刊物，均應大量的無價贈閱。

(二)無論公私費留學生，出國之前，應由當地或中央的教育機關予以訓導，使知自身受國家優渥的培植，出國後有為僑胞服務的責任，並需利用機會隨時隨地作有利於祖國的宣傳工作。抵達國外後，由領事館就其就學地區，指定其應担任之任務。

(三)養成各地使館協助僑胞教育，認真推行新生活，以改善僑胞的生活習慣；並負責指導留學生宣傳方法，供給宣傳材料，以加強國民外交活動。並應規定以上兩點為外交官考成的重要項目。

如果以為改善僑務是不急之務，那是極嚴重的錯誤。須知我們不僅在此生死掙扎的關頭，需要僑胞在經濟上，外交上予祖國更大的幫助；即在將來抗戰勝利，努力建國的時候，有賴於僑胞的合作者更多。這件工作已被耽延很久，不應再事蹉跎，希望全國人士從各方面努力，把我們一千餘萬「沒有國書的使節」的偉力充份發揮出來！

許汝社

日內瓦的新墳，而今已經長上青草了，縱然偶而有人在墳前或則稱揚死者生前的功績，或則便說死者尚沒有全死，

也徒然使墳場周圍顯得更加陰沈，更加廖廓而已。

二十年前，這一塊墳場，也曾是千萬人的聖地。二十年前，血流盡了，從美洲到西伯利亞，到處橫着一個個荒塚，人類從古難之中，所見了自己善良的天性，方在血與肉的發壇之前，把理想與希望，寄托在一個世界組織之上。我們這一代雖然有的還不及親見人類如何在當時嘗盡了血腥，渴望着一個新的秩序之出現，然而我們披讀，二十年前以前的歷史，看人類如何在生與死之中掙扎，如何崇拜一個人間的總統，有如天上的彌賽亞，誰能不成動得滿眶熱淚。

人類的希望，恐懼，悲哀，歡樂的本能，是今昔共通的，我們生長在東方的一個偉大的時代，理解得自然尤其親切；唯共如此，我們親見歐洲的弟兄們，重複拾起二十年前血腥的利刃，尤加過止不住滿腔悲憫的情懷。從但澤小城傾瀉下來的溶流，煽起了全歐洲的烽火。完成了二十年來歷史的一大循環，二十幾年間，墳墓之上，曾經築起和平神聖的殿堂，和平神聖的殿堂，又復淪為一片廢墟，一堆青塚。歐洲的弟兄們，此次重拾起血腥的利刃究竟是爲了要再造真正和平的殿堂，還是要類添一堆堆青塚？

在東方戰爭之中，善與惡分明得如同白日與黑夜，但是在西方，政治家對於正義的解釋，正好像一套套五花八門變不盡的戲法，四五個月來我們雖然懷着滿腔悲憫，傾聽兩方的陳述，但是結果這只是一片模糊。

交戰的兩方，也曾經鬧成一片，大事所關或首的宣傳，前次歐戰當年，威爾遜總統曾經把德國政府與德國人民，分

成兩件東西，揚言協約國是對德國政府作戰，並不是對德國人民作戰，此次英法宣戰的理由，又因盡了威爾遜當年的理論。在英法的心目之中，德國國內的一暴君一倒，德國又可以參加歐洲和平的陣營。

戒行的說法，其實是難說的，前次大戕賊後「戒首」論的破產，便是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在上一個世紀以內，德國曾一度參加白由主義的陣營，當時神聖同盟的靈魂梅特空急匆匆被追逃亡，全歐洲到處聽得到咒罵獨斷主義的聲音，其時英國人以為從此以後德國可以改過自新了，然而，曾幾何時，鐵血宰相出現了統一德意志民族的大難一升起來。德意志人民便心服情願地把自由交給了一個人。當時，英法的怨恨，集中在俾士麥一身，然而，他們仍以爲俾士麥一去，萬事就可以如願了。不料俾士麥一去，威廉第二恂莽莽撞撞手，掀起了場四年的大禍。戰後申威瑪告和國，制定了全世界最進步的一部憲法，然而十五年的庸弱，終於激起了強烈的反動，全德人民再度把自由冊交給了一個人。

戰爭的原因，豈僅僅在少數人？消弭戰爭的原因，才是政治家思想家的事業，頻年以來，人類在頹頹焦焦恐懼失望之中生活，由是有少數才智之士，抱着悲憫的胸懷，要替人類指出一條解脫的途徑。寇蒂斯要用宗教來統一人類的思想，洛裏爵士要用英帝國的艦隊，維護大英式的和平，斯特萊特要採擇國際聯邦的制度，維護歐美的和平。算是提出了三個最重要的理論。

斯特萊特的理論。已經成歐美政界思想界的爭論的中心

這位巴黎和會中的美國專家的二十年來，常駐在日內瓦，作為紐約時報的訪員；他深感到國聯天折的原因，不在國聯本身機構上有何缺點，而在乎各個會員國使用主權的沒有限制，他在漢密爾敦，瑪迭遜，傑三氏的「聯邦論」內發現了新世界的模型，要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洲、法國、比利時、荷蘭、斯干的納維亞各國、瑞士等「大西洋上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國際的聯邦，把本國的軍備等等主權，交給聯邦政府，要模倣美國獨立以後的情形，逐漸使每一個國家，成為國際聯邦一個單位，以實現世界的和平。

英國外次白特勒曾經在議會內述及過「國際聯邦」的字樣，然而，「大西洋的民主國家」，如何使之聯合起來呢？僅僅是「大西洋上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是否可以保持普通的世界和平呢？斯特萊特道出了人間屠殺的原因，恰只在天上畫了一灣殘缺的新月。

拉斯基主張在此次戰後締造一個歐洲的聯盟，凡是參加

論 米 內 閣

在米內閣兩年以來堅決執行抗戰政策之下，敵寇的內部開又以前個月零十八日天的短命於本月十四日夭折了，繼之而起的，是米內內閣，如果按照米內閣，這一新內閣，正是戰時日本的第四代內閣！

聯盟的要把主權交付聯盟用和平方法，解決一切爭端，把國防軍隊，交給聯盟，以保障互相的安全。拉斯基的主張，可以算是引伸斯特萊特的理論，然而，各國內在的矛盾不消除，國與國之間的矛盾不消除，歐洲的聯盟，如何可以長久維持歐洲和平。

斯特萊特，拉斯基等等的理論，算得是四十年代。人類崇高的理想，然而，這還不過是空中美麗的氣泡，一觸及現實，就不免於幻滅。

歐戰五個月來，各國的政治家，用盡了巧妙的辭令，要把戰爭的責任，諉給對方。要替世界，創造一個永久的和平。領袖們的話講完了，民衆的激烈沸騰了，無數的生命，倒在戰場上，一切都是爲了一個模糊的理想，我們在遙遠的東方，誠然還看不到這一個模糊的理想裏任何的一點輪廓，我們終企望歷史的再演不致於那樣慘痛地重複，希望在這一次的血腥之中，歐洲的弟兄們能尋覺到他們一個新的和平的天堂。

金長佑

因此，我們在這裏，僅僅從表面上來觀察這次日本在戰時的政局的演變，也是極盡日本有史以來政變頻仍的大觀了！原來，日本自實施憲政以來，已有五十五年的歷史，歷經三十七個內閣，所以每一個內閣的壽命平均要有一年零五個

月，但自日本發動侵華戰後，迄今不過二年零六個月，而先後竟更迭內閣四次之多，平均每七個月就要有一次之變。這要以與日本過去在甲午戰爭之由伊藤內閣和日俄戰爭之由桂內閣一手來支撐整個政局相比較，真是有天淵之別了！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在實際上更迭內閣並不能絲毫解除日本的危機，這可以分以下幾點來說明：

第一，所謂日本的危機，並不完全是「一」的問題，因為如果以人物論，近衛內閣在成立之初，幾為舉國一致所擁護，中日戰爭爆發後，近衛本人亦曾自信有力在短期內結束戰爭，但經一年餘之掙扎，並三次徹底改組內閣，還是不能免於一死，隨之平沼內閣成立了，按理平沼既係日本法西斯大本營的國本社的首領，而又向來是為軍人所擁護，至少在國內應有一番振作，但結果却落得一個「日本不孚人望的一個內閣」的頭銜，而藉口於德蘇互不侵犯的成立，國際發生重大變化，狼狽鼠竄以去！乃至阿部內閣成立後，誰在輿論上被目之為庸儉無能，但阿部本人却始終不失為平實近情的政治家，他在登台之先就已承認中日問題的重大，既任首相之後，更公開向其國民告白：「解決中國事件並非怎樣簡單」。又說：「國民政府現擁有軍隊二百四十師，其外尚有游擊隊一百萬以上，如何解決此巨額之軍隊，如何應付國內之經濟問題以及如何應付第三國之態度，均為棘手之問題，因此，欲求徹底解決中國事件，至少須五年或十年之久」。這無疑的是阿部想利用首相地位，以正確觀念來啓迪軍閥，感悟國民。然而，軍閥對於這個道理是格格不入的，國民

又始終被悶在鼓裏，而政黨却無恥的大投其機，開始聯合向阿部進攻，於是阿部也倒了！

第二，正因為日本的危機不完全是一「一」的問題，而是「一事」的問題，所以阿部雖然倒了，日本的危機並不會隨之而消滅。所謂阿部內閣在成立之初，曾宣稱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但結果亦因「中國事件」未能解決而塌台。此外如外交問題，如國內經濟問題，也是日趨嚴重，急切的需要縱任內閣來解決。本來阿部內閣，在瀕死前的最後一刻，也未嘗不想以「非常手段」來打破難關的，例如不惜的開放長江一小段為餌，以誘美國緩和對日經濟的壓迫；它不惜草草了事的接受蘇聯對於漁業糾紛的暫時解決辦法，並希望在日蘇商務談判中有所收穫，以為日美談判失敗作掩飾；而最後它甚至想把製造偽「中央政權」大吹大擂的熱鬧一下，以轉移國民的視線，藉圖延長內閣的壽命。但，結果全歸失敗了，這證明日本危機之深，更證明縱任內閣責任之重大。

第三，像今天日本所步入的滅亡途程，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必然階段，也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應得報償，除非我們甘於淪為日本的附庸，就像汪精衛所做的那樣，日本帝國主義是毫無問題的，要消滅在我們的堅決抗戰國策之下的。還在去年今日（一月二十六日）我們的最高領袖即曾指出，「今日問題，祇要我國不授敵以可乘之隙，就是最後勝利確有保障。什麼是授敵以隙呢？我若精神受其威脅，意志為所動搖，自甘屈服，急求妥協，那就是敵人之所大欲，惟有這樣，敵人才可以解脫他無法自拔的苦境，補救他

無可挽回的弱點」。所以我們今天可以斷言：祇要日本不停止侵略，中國中途妥協，日本任何一個形勢的內閣的出現，都不能挽救其危亡於萬一，而最後又必將陷入與近衛、平沼、阿部相同的命運。

所有這些，在近衛，在平沼，在阿部似乎都很瞭然，所以像過去他們在自己任內所做的，那些足以延續內閣命運的工作，我們在今天實不應單純的解釋其為倦戀權權，而是他們看穿了更迭內閣並不能絲毫解除日本的危機！就是軍部也明白這一點，例如它在阿部內閣倒潰之前，曾公開表示希望政黨對內閣幫忙，而阿部本身亦在軍部默許之下，遍訪政黨首領，並三請民政黨總裁町田出任艱巨，都是極其顯著的證明。甚至到政黨方面，如五黨首之反對議員倒閣運動，也不外是與阿部具有同一見解。不過後來因為政黨要投機，而軍部也怕阿部內閣在外交上不能有新開展，中途變了卦，放棄對於阿部內閣的支持，這才使阿部內閣無可如何的宣佈瓦解了！就在這種前生注定的環境之下，米內內閣誕生了，無疑的其結果仍然是一場悲劇了！何況米內內閣本身又有其先天的弱點呢！

米內內閣的先天的弱點之一，是在事前未能獲得軍部的同意，這是近十餘年以來在日本政治上所未有的現象，據傳這次政變，直到決定米內組閣前一小時，畑俊六尚相信大命將降於其自身，故當日皇命令米內組閣後，日皇隨即詔見畑相，命其「當組閣之際，應與米內大將協力」（此亦為日本向無前例之行爲）可見當時事態之嚴重，然而軍部對於這

種措置是不滿的，例如最近一部少壯軍人已露骨指責元老軍臣玩弄政治手腕，欺壓陸軍並是其將來的演變，正未可等閒視之！

米內內閣的先天的弱點之二，是那些推薦米內組閣的人們在對時局認識上並未完全一致，米內的登場不過是在困難環境中之不得已，而非所謂擔當變局之理想人物，日本在今天必須與近衛、平沼倒閣時的情形不同，「一國謀」中國事件之解決，一面謀國內緊張局勢之緩和」。所以首先在軍部方面，一致主張擁護近衛出馬，並反對世界所傳之次善候補者（如宇垣、荒木、南、池田以及政黨首領等）以及由現役大將（如畑、杉山等）直接担当政局；而在元老重臣方面，如平沼則認為就處理事變立場言，以畑或杉山為適當；如近衛則認為若以處理國內問題為第一條件，則以池田成彬為適，當然不過，近衛首先就拒絕組閣，而畑、杉山、池田又為軍部所反對（最後軍部又不反對畑大將組閣，因恐政權落於海軍，但時機已過）最後遂不得已選上了海軍的米內，據說米內被推薦的重要原因有三：（一）重臣仍認為對美外交乃日內政問題及處理中國事變之關鍵，故側重海軍之穩健人物；（二）米內在平沼內閣任海相時，曾與石渡有田合作推翻板垣陸相之「日德軍事同盟」案，頗能內得重臣之支持，外博英美之好感；（三）米內在七十四屆國會反對「無限制之國防擴張」及無限制之統制經濟政策，頗得自由主義者及財閥方面之同情等等。然而不管米內內閣是否真能具有這麼多的優點，乃至這些優點是不是就能夠解除日本的危機，但至少在目前

正因為米內閣具有這些優點，才必然要和軍部立於衝突的地位！所以在將來米內閣能否消除與軍部的矛盾，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在我們明白了米內閣生前所注定的環境，和它的先天的弱點之後，可知米內閣在轉換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上，絕不會發生絲毫的積極作用，最好也不過等於注射一管強心劑，消極的起一點續命作用而已。

例如就這次米內閣的陣容看，財閥與政黨力量的顯然增強，就是一種人工的為日本帝國主義續命的明證，像三井系大財閥藤原銀次郎之出任商相，工商界重鎮櫻內幸雄之出任藏相以及池田成彬，代理人石渡莊太郎之出任內閣書記官長，至少對於修正日本現行的金融財政政策上可以獲得一點財閥的暫時支持；而民政黨代表勝正憲和政友會代表島田俊

美日交涉中的幾個要點

郭斌佳

目前一般人士的心目中，把美日兩國的交涉看得非常嚴重。甚至有一種假定：一俟正月二十六日美商約失效，美日關係即將急轉直下，而遠東的大局，亦將隨之而變。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簡單。當然美日的關係已到了嚴重的階段，但今後的演變，恐怕還是緩的成份多，急的成份少。

我們可以大膽的說：美國對日基本政策，是不會變的。無論日本怎樣宣傳，怎樣誘脅，美國不會放棄他歷來所付遠東問題的立場。因為美國的政策以過去一百年積下的主義

一屆的議會。松野鶴平之參加新閣，也很可能使米內閣無事通過這一屆的議會。

不過，問題是米內閣所做的這一點點續命工作究竟能起多少作用？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答覆是：毫無補於實際！因為根本問題要看米內閣能不能解決「中國事件」，而解決「中國事件」的唯一條件，就是日閥停止侵略。然而在今天無疑的日本軍閥還沒有覺悟到這種程度，米內閣雖有財閥與政黨參加，但其侵華的根本政策並沒有改變，米內閣的誕生，只是日本帝國主義放下的最後一注賭本，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崩潰前的一個迴光反照，所以，米內閣能否繼續下去，全看我們能不能認識到米內閣的這一點，堅決的抵抗下去。

其理論的根據，而其行動則純粹以維護條約尊嚴為準則，並非故意要反抗日本。因為這個道理，美國對日政策之一貫性，可毋庸置疑。並且我們檢討過去兩年中美國對日的行動，由於抗議而取斥近衛聲明而聲明廢約，可見美國對日的壓力，是不斷的在逐步增強。美國又若不若英法有歐戰的顧慮，他的偉大的經濟力量，誰都知道足以牽制日本。從各方面看來，美國對日固不肯改變其立場，同時也毋庸改變其立場。

但是不變化，並非說就會對日取積極的行動。這裏差的

距離還很多，美國可以以不轉化為止，而不前進；亦可以繼續抗議日本的侵略，而不下手，僅僅留着自由地步，以備將來再取積極行動。這都是可能的事。要知美國政府與人民都不願牽入任何戰爭漩渦；許多美國人心裏總覺得單為遠東問題不值得孤注一擲；同時又有一部份商人與日貿易有密切的關係，自然不願對日取積極行動，損害自身的利益。這些問題，都會造成相當的力量。我們儘管盼望美國的主持正義，制裁日本，但這些事實，是不可抹殺的。

現階段美國的態度顯然是尚在猶豫之中。所謂猶豫，可以換句話說：要想採取積極行動的力量，一方面固在邁進，但也沒有完全戰勝反對的力量。所以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格魯大使與野村晤談之時，美國的政策是「剛柔並用」的。美國所反對的是：(一)日本對美國在華利益之威脅與剝奪；(二)日本在華的擾亂幣制；(三)在美國在華利益未得日本尊重前希求續訂日美商約。可是同時美國也允諾，在一月二十六日之後，美國並不援用一八二八年之法律增加日貨進口稅率。同時又允許日商在美註冊商標等事。美國的態度很明顯的是：假如日本不再侵犯美國在華利益，美國也不願再事前進。我們最應該認清的，就是美國對日的態度，並不像一般

日本現勢論

寫歐洲外交史的人，曾說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之

想像的那樣激烈。

因為這個原故，日本今後行動，大有關係。假如日本轉化下來，接受美國一部份的要求，限制他損害美國的利益行動，那末美國恐怕就不容易採取強硬的舉動。因為美國的手點還未超出保障利益這一步。因為美國人民仍守着不願多事的心理，美國對日政策立即挺進的可能性也就不多。

然而我們不是說過，美國對遠東的基本政策是不會改變麼？既然基本政策不變，而一時又不易積極行動，那末在不久的將來，恐怕美日兩國的衝突將拖延下去，作慢性的展開。其演變的方式，將視兩個問題而定。第一、日本是否繼續其侵略行動，損害美國的利益？第二、美國人民能否充分了解美商對日接濟軍火等於參加其對華侵略？關於第一問題，恐怕日本的侵略是要繼續前進的。關於第二問題，也有相當的希望。這兩點都足以使美國日漸加強其信念：對日本的侵略，非積極行動不可。但這個局面的演進，需要相當的時間，決非一時一刻即可形成。所以我們認為在目前這階段中，美政府能做到的，是：對日逐漸加強其壓力，並留着自由行動的地帶，以備將來針對日本的侵略，按步採取積極的行動。

楊玉清

敗，非敗於軍事，而是敗於政治，因為政府的一切大計，都取決於軍人。曾有幾次德國可以和協約國和，如那時和議告

成，德國還不至失敗到後來那種田地，但因爲得不着前線將領的同意，於是就失掉了許多機會。到後來失敗之局已成，政府接着了前線將領的一封信，才不得不提議立刻與協約國停戰。現在日本的政治，恰好犯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所犯的毛病。

軍人不干政治，這是明治天皇的詔諭。日本維新的成功，憲政基礎的樹立，也可以說，就得力於軍人遵守一條詔文。怎奈近十年來，日本軍人的行動，完全違反了詔文的意旨。他們自己這樣辯護：謂他們的問政，不是以軍人的資格問政，而是以國民的資格問政；不能說因爲一爲軍人，就取銷了國民的資格。尾崎行雄說得好，以過去濫閱的軍部，到現在擴大爲軍部的日本，這就是說，日本的全局，已是在軍部掌握中的天下。

我們看最近十年來的內閣，從濱口雄幸起，到最近之米內光政止，中間經過十一次的更迭。任何力量，無論居政黨也好，元老也好，官僚也好，都被軍人的槍桿，打得粉碎。事實證明，誰也沒有領導軍人，而是追隨軍人。軍人的力量，壓倒了日本政治上的任何人。

日本的政治，是天天在那兒搖動；日本的政治，已經失掉了牠的重心。一切大計，都取決於軍部，內閣只能仰軍部的鼻息，作些不關痛癢的事情。最近米內光政上台，當然也不能例外，仍只是一個過渡內閣，恐怕還不是收拾日本政治局面的人。

至於經濟方面，日本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雖然因緣時會，塗上了一些現代國家的脂粉，但一旦有事，仍掩飾不了牠殘缺不全的本來面目。歷史上的幾次戰爭，太便宜了日本人。他們以戰爭興家，所以提到戰爭，老是眉飛色舞。那曉得這一次不宜而戰的規模，大過過去一切的戰爭。他們內部，呈現着歷史上未有的窘迫。

日本農村，天天走向毀滅的途中。現在農村的勞動力，除了出征者外，大部份流到了工場礦山。農村的勞動力，大見缺乏。在農村中，找不着年青力壯的人，如果有，不是自癡，便是逃避兵役的人。每個家庭，只殘留着極少的人口。他們的生活，受着重重的壓迫。地租高漲，捐稅加多，他們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債度日。在日本農村中，除了極少數的富農外，很少有不自負的農民。

日本的工業，到現在是畸形的發展。日本人自稱的最氣，只是軍需工業方面的景氣。日本固有的工業基礎，輕工業，到現在都一天一天生產減退，甚至於有些根本停止了生產。據數字統計，在一九三八年二月的生產指數，比起一九三七年二月的生產指數，綿絲業生產，已減低百分之三十八；毛織業已減低百分之五；絲織業已減低百分之二〇。八；人造絲織物，已減低百分之四十五。兩年以後的今天，更用不着說了。

日本對外貿易，連年老是入超。他們每年輸入重工業所需要的原料，或占全都輸入之半。這爲了彌補資源的貧弱，不得不然。一九三七年的入超，有九億六千餘萬元；一九三

(一)

八年的入超，有五億六千餘萬元；秘密輸入的軍需用品的支付，還不在內。所以平衡入超，這在他們當前所放慮的絕大問題。

日本的財政，更是陷於不能自拔之境。截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止，所發行之公債，已達一百八十億元。加上本年所預算發行的六十億公債，即有二百四十億元以上。最近已規定綠茶、肥皂、牙膏、家畜等均一律徵稅。娛樂捐提高至百分之三十；飯館內免稅標準，自五元減至三元，其稅率自百分之十，增至百分之十五。這可見其窘迫一斑。

物價騰貴，民不聊生，於是成了當然的現象。截至一九三八年止，比起一九三七年，物價的增漲，有高達百分之百者，一般亦在五六成以上。如甘薯則高至百分之二三五，洋蔥則高至百分之二二一。其他魚類肉類木炭火柴，有加至四成、五成、六成不等。衣料多加至百分之七十；毛巾則加至百分之五十。此外還有黑市場的交易，有些東西，常較以前高出數十倍或數百倍的價格。

(三)

我曾把最近十年來的日本外交，分做三個階級，一個是協和外交，一個是焦土外交，一個是協和其名焦土其實的外交。一直到現在，還在協和其名焦土其實的外交途中。

什麼是協和外交？這就是幣原外交。幣原是一個有現代眼光的人，他對日本軍人的行動，深致不滿。甚至於在九一八事變後，他還說，日本佔領中國的東北，無異於自己吞下一顆炸彈。所以他所主持的日本外交，是和平的，是公道的

，是合理的。怎奈這種開明的外交家，終不容於軍人，則現在幾乎絕迹於政界了。

什麼是焦土外交？這就是內田外交。內田受軍人的擁戴而上台，他對所謂「滿洲國」的承認，下了絕大的決心。他說，如果因為這個問題，發生困難，日本也要鬥爭下去，縱使日本化成一片焦土，亦在所不惜。所以從此以後，承認所謂「滿洲國」，脫退國際聯盟，這些不平凡的事情，一幕一幕出演。日本在外交上的行動，竟成了一意孤行。

協和其名焦土其實的外交，就是廣田的外交。廣田鑑於內田外交的失敗，使日本在國際間，成了一個孤獨者，四面只有敵人，而沒有朋友，於是他極力主張作「協和萬邦」的工夫，活躍於國際舞台，希望拉攏些朋友。怎奈這種手段，掩飾不了他的獍獠面目，人皆望望然去之。與德義簽訂防共協定，也可以說是一套新花樣。其實得不償失，到最近德蘇協定出世以後，才證明這一幕滑稽戲的失敗。廣田的確是一個聰明人，他骨子裏是繼承了內田的衣鉢，而口頭上偏要採取幣原的詞令。

從廣田以後，一直到現在，日本的外務大臣，雖有所變易，而這種協和其名，焦土其實的精神，始終如一。尤其是從中國抗戰而後，更可證明，日本的政策，是要把自己化成焦土。姑無論自己願不願意，而事實決定日本是一天一天走向了焦土的前途。

自然，日本何嘗想把自己化成焦土，兩年半的戰爭，他是要先使中國化成焦土。他又見到解決中國的問題，絕不能

單獨在中國身上打算，依然不能不努力國際環境的好轉。所以他對中國，儘管是強硬，而對其他各國，却是極盡孤獨之能事。

最近他利用歐戰的爆發，表示不參加，一方面以此示好於英法，一方面借此擬有所要挾。英法自然是同情中國抗戰的。英國對中國的援助，曾盡了他不少的努力。此番日本利用時機，特別對英國用工夫，他覺得只要英國停止對華的援助，日本的壓力，就可以減輕些。

日本與蘇聯，是世仇。防共協定，是以蘇聯為對象；也可以說對華的戰爭，就是要逼迫中國走上反蘇聯的一面。但是人類的行動，沒有固定的路線，尤其是無理性的日本人，其行動更不可思議。他爲了要以全力決解中國問題，他於是不惜對蘇聯暗送秋波。他很想步德國的後塵，與蘇聯為友，他以為能拉攏蘇聯，就可以使蘇聯停止對中國的援助，可以增加戰爭的資源。

日本對德義，本無所好惡於其間，簽訂防共協定，也不過是互相利用，以威嚇英蘇而已。自德蘇協定簽訂以後，日本雖然憤慨失望，但他對德義，還留着勾結的餘地。日本向來主張與德義合作的人，至今還沒有打掉他們的努力。

日本最感覺頭痛的，還是對美外交。日本的戰爭資源，大多取給於美國。美國對歐局雖較冷淡，但對遠東却異常關切。最近歐戰發生，美國天然會同情英法，在東方也要作英法的後援。對在華的利益，自不會放棄。日本欲以全力解決中國問題，而自號建設「東亞新秩序」，而第一個遇着的困難，就是美國的不同意。美國是九國公約的倡導者，日本人欲獨占中國，自是美國人所不能坐視的。

前阿都內閣，以野村為外務大臣，唯一的意義，是側重對美外交。美日商約之廢止，格魯美使之談話，的確給日本人的刺激不小。無論美國對日本如何，而日本必須以重價來與美國周旋，這是必然的事實。最近有田任外相，當亦不能跳出此範圍。日本人骨子裏是焦土，而口頭上却是協和。日本人對中國是焦土，而對其他各國，却是協和。尤其是對美國，必低聲下氣，以求得美國之諒解為止。

有一個時期，日本人確陷於孤立之境。英法既無聯蘇；美蘇更乏淵源；德義又別有新歡。到近來英法欲拉日本以自重；德蘇亦望日本惠然肯來；美國對日本，也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末樣深惡痛絕；美國遠在西方，對日本更不會存什麼惡感。不過日本在這國際局面千變萬化，左右做人難的當兒，也就苦悶萬狀，窘態畢露。

(四)

中國近百年來的政治史，與帝國主義在東方的侵略史分不開；尤其是近五十年的政治史，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史更分不開。民國以來的每回大事，無不有日本在背後作祟。日本的政治，成了中國政治的領導者。自從盧溝橋事變以後，中國的政治，才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而日本的政治，反隨中國政治演變為轉移。近衛平沼阿部等內閣的崩潰，就是最好的證明。

據日本人自己的記載，當日俄戰爭時，伊藤博文對中國

的獨立，還是很尊重的。他覺得朝鮮可以收為保護國，可以進而併吞，對中國則不可以等閒視之。中國存在，這是日本人之福。不然的話，擾亂了中國，至多是一個瓜分之局，日本也沒有獨占的可能。甚至於瓜分了中國，也不會便宜日本。也許繼中國之後，日本又成了歐美人侵略的對象。

可惜這種賢明的見解，沒有為一般軍人所領悟，從一九一八以後，日本軍閥大發瘋狂，要想鯨吞中國。先是想利用外交方式，不戰而亡中國，廣田三原則的提出，就是這種夢想的開端。但今日之中國政府和人民，已不復是二十一年前之中國政府和人民，我們一經日本的武力侵略，便毅然抵抗。現在戰爭已延續到二年半，而這個戰爭何時可以結束，日本自己也沒有把握。

從戰爭開始的那一天，也可以說，就是日本失敗的那一天。因為與中國作戰，原非日本本來的打算。日本的陸軍，是對付蘇聯的；他的海軍，是對付美國的。他對中國，不僅不預備自己犧牲，還怕犧牲了中國的實力，因為他想利用中國所有人力物力財力，來補日本的不足。現在不但中國的實力，他利用不着，而且為了中國，他反犧牲了他意料之外的不少的實力，這一點，是日本人所焦慮不安的。

近衛聲明，平沼宣言，目的都是想結束戰爭。但是中國抗戰的決心，却未曾稍有動搖。阿部上台時，他唯一的使命，是以全力解決中國問題。但阿部終于必須承認國民政府保持著很大的實力，他承認這個戰爭恐怕要繼續五年或十年。

日本人都想結束這個戰爭，都知道長此下去，既沒有意

義，又沒有前途。但是在軍人劫持之下，沒有人能夠負起這個責任，在這種非常時期，才知道政治家對於一個民族前途的重要。日本現在所缺乏的，不是軍需資源，更不是糧食土地，所缺乏的，還是政治家。日俄戰爭時，日本與俄國畢竟議和了，但負議和之責的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曾相對而泣。他們知道自己的實力，不夠與俄國久戰；同時也知道如此議和，必不足以遏止國民的憤怒。但是他們仍毅然決然以國家民族為重，以自己的名譽生命為輕，而簽訂和約，而忍受賣國賊的頭銜。日本之有今日，我們不能不承認是得力於這般政治家。可惜得伊藤博文，陸奧宗光，不復見於今日，於是日本的命運，只有斷送於軍人之手。

(五)

論述日本的現勢既畢，謹再就日本的前途，略述所見如下：

日本國內的政治，現幾全受軍人的支配，但最近日本政黨已有四人參加內閣，議會亦將開會，不時還有恢復一憲政一常道一的呼聲，所以日本的政治容式，還有改善的可能。

至于國內財政經濟的窘迫，也是當然的結論。任何國家，到了戰時，都是捉襟見肘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擔砂糖角糖，還要放在保險箱子裏。這雖然是一句笑話，但可見當時物資的缺乏，人民的困苦。目前日本的窘迫，或者還沒有到世界大戰時的那種程度，但祇要戰事延長下去，日本國內的財政必愈益困難而終至于崩潰。

日本的國際環境這兩年來確極惡劣。但外交既講利害，試

不論道義。強國比弱國容易說話，容易活動。今後英美如何對付日本，還須視我們抗戰的情形而轉移。「中國事件」，對他們固然是不治之症，但是日本既已錯下了這一着棋，我想現在日本軍人還沒有交着重大失敗的教訓以前，恐怕他們仍要硬拚到底。

我總覺得，日本的困難，不在對付中國，而在對付國際，對付歐美。阿部上台以後，明明說是以全力解決中國問題，但是他的表現，不是對華的談判，而是對美的交涉。他覺得解決了國際的問題，而中國的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當英日同盟時，有一部份人的見解，主張與俄國聯盟。伊藤博文，就是主持日俄聯盟最力的一個人。他覺得與俄國聯盟，就可以穩定東方的局面，同時有餘力去對付歐美。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一部份人的見解，主張與德國同盟。他們覺得日本如果參加同盟國方面，美國也許就不會參戰，大戰的形勢就會為之一變，成敗在誰，誰也不敢斷言。如果真是同盟國勝利，那末，日本的收穫，當然要比今天

漫談生死

「未知生，焉知死」！生死這問題實在太神秘了。孔聖人原來是欲以實際實用的人生哲學來教導華夏民族享受王道主義大同世界的理想生活，所以任如何，也不肯涉及這虛浮飄忽的詭譎問題。可是理想不一定這末高尚，而又適從敵八毀滅主義下的炸彈與燒夷彈的瓦礫堆中與硫磺煙霧中掙脫

的多，日本就可以把英法在東方的勢力，取為己有。

日本人一直到今天，還在做這一個夢，所以有人主張走到蘇德的那一面。他們認為如果歐戰長久了，德國真是勝利，日本的收穫，就會比參加英法一方面為多。

日本大認為歐戰的發生，是天助日本成功。日本不但易於解決中國問題，並且易於在國際間投機。

日英談判於前，日本談判繼之於後，也許又有一幕日蘇談判，會表現在遠東舞台。日本人在外交上是步步不放鬆。日本在華戰爭的損失，企圖從這些方面，去彌補起來。

至于中國兩年半的抗戰，是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與不可征服。但是二十世紀的戰爭，並不單靠戰場上的力量，還要靠外交的活躍，政治的鬥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人們把勝利的旗幟，不歸之於武裝戰士，而歸之於穿黑禮服的人們。我們看看在抗戰之中，我們那些穿黑禮服的人，是否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如果不，我們就要問：還是他們本身不努力呢？還是環境不容許他們努力呢？望國人於此多注意及之！

袁英昌

出來的人，對於這詭譎之謎，委實感受一種難刺不清的壓迫，非把它從腦海內驅逐到紙上，由紙上消散到人間，而復沉淪於烏有之國不可的形勢。所以這漫談生死非特不是故意違犯聖人的遺訓，而實大有情不自己的苦衷在在。可是這問題真的詭譎得如此厲害，雖然祇是漫談，却也

不知從何談起：所謂亂麻一團，從那兒去捻住它的綫頭呢？最近重讀老殘遊記，覺得作者劉鐵雲在自傳裏一段話，說得意味的確深長。就把它抄一節來作個線頭吧。「嬰兒墮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環繞，其泣也號咷；然則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為衡；蓋哭泣也者，靈性之現象也。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馬與牛終歲勤苦，食不過芻秣，與鞭策相終始，可謂辛苦矣；然不知哭泣，靈性缺也。猿猴之為物，踞踞於深林，飽厭乎梨栗，至逸樂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博物家云：猿猴動物中最近人者，以其有靈性也；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於紅樓夢；吾人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

「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其感愴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可謂道盡千古人生的真義！可是靈性何以生感情，感情何以生哭泣，何以又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涵義雖甚顯著，卻亦不妨加以申述。大凡靈性越是發達的人，感覺力也就越是敏捷；感覺力越敏捷，對於生命的體驗一定更加深切。天光雲影，鳥語花香，水流風嘯，猿啼婦泣，那兒不使他的性靈感覺生的意態，活的表徵？由體驗到外界的活，而意識到已身的生，也許是由意識到已身的生，而體會到外界

的活，實在是人對於生命第一步的認識，而與笛卡兒有名的哲學據點：「我思想，所以我生存」，大約不會距離得太遠。由意識到物與我，我與人共同生長在這人間世，而對於與我共同享受生命的與人與物發生感情，當然是一種必然的趨勢。這意識的程度越是深入，感情的本質必定是越熱烈，意識的範疇越廣遠，感情的容量必定是越充實，更是一種必然的定律。這定律的作用並且是相互為因的，大概感情深督而豐富的人，對於生命的意識沒有不深切而廣大的。

但是意識 (Consciousness) 到底是何所謂呢？意識的源頭，無疑的是起於靈性，可是它的內在的本質與這本質發揚於外的活動，却是我們平日所稱的生活力。譬如，我們稱贊某人活潑伶俐，生氣勃勃，其實就是說：這人對於環境着的生命的意識非常銳利，而這銳利的意識發揚於外 (expressed to the surroundings) 的行動又來得異常靈活，使他整個人表現生活力充實的樣子。可是宇宙之內，生物何止萬千！惟有人纔知道自己有生命，而同時能夠意識到同舟的大生命。然而人類錯雜，芸芸總總，固亦有上智下愚賢與不肖的分別。下愚如癡兒駘女，或稍上之如庸碌常人，一生混混沌沌昏昏憤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畢生照照攘攘，也總兜不出一個男女飲食的圈子。上智如孔明，岳武穆，文天祥以及其古儒史上轟轟烈烈的人物，意氣縱橫，情懷拓落，以天下之樂為己樂，以天下之苦為己苦。至於周公，孔子，釋迦牟尼，耶穌那種神之彌高，鑽之彌堅的神人，則其胸懷的廣大，簡直與宇宙同經緯，其感情的漫漶簡直包括全人類而有餘澤及於

禽獸。這三種人物，都是人類，耳目口鼻，四肢軀幹，固無有異，而何以生活的狀態却又如此的迥別？推究其因，當然不過是靈性有高低，感情有豐歉，意識的範圍有大小之分別，也就是說：這些人內在生活力的本質有充實與不足，有深厚與淺薄的相差，而發揚於外的生活狀態各有所不同而已。這種生活力，用普通語句說起來，在內的蘊蓄則為「情」，活動於外面及於一個對象者則為「用情」。平常每稱：「某人情重，其實就是說：這人內在的生活意識十分銳利而豐富；某人對於某人用情，也就是說：某人的生活力向外活動，而放射到另一人身上去了。試觀歷史上或小說中人物，凡是最受人崇敬與愛戴的，而又最動人肺腑的，無一不是情深似海，情重如山，而用情的方式則如又巨風之掃沙漠，海潮之推浪，洶湧澎湃，其勢不可抵擋。記得少年時讀三國演義，讀到關公走麥城，竟是哭得淚人一般，至今思之，猶覺餘哀嫋嫋，流連在性靈深處。又記得讀說岳全傳，讀到風波亭處，簡直悲憤填胸，同仇似火，恨不得拾起湛盧寶劍替岳王殺死奸賊，為漢族殲滅胡奴，而代萬民吐一口怨氣。又記得讀紅樓夢，讀到寶玉出家的地方，我的心如同一顆巨石，從生命的盤根所在，往下祇掉，一落千丈，簡直不知落到宇宙的何方去了，眼前煙霧瀰漫，黑暗無邊，一切生命似乎都與寶玉消散在那虛無飄渺，色相皆空的不存在的境界去了。我想讀這些小說的人，大約都有這種感覺，祇不過有輕重深淺之分罷了。這種感覺究竟從何而來？當然是由小說家將這些理想人物的人格，建築在一個「情」字與「用情」的方式上面

。他們用情的對象雖然有異，而其情重則是一樣。關雲長的全部生活力量用在友情上面。作者把他寫成一個忠魂耿耿，浩氣如雲的熱心人物，早已獲得讀者的全部同情，故他走麥城的敗死，令人不能不痛哭流涕。岳武穆的全部生活力量用在象徵我們華夏民族的宋皇上面。「精忠報國」是他整個人格與生活的結晶，而其生活方式又如此的轟轟烈烈，浩浩蕩蕩，如長風的過海，如夏日的經天。讀者早已拜倒於其偉大磅礴氣概之前了，眼見風波亭的悲劇，又何能不怒氣冲天，敵愾如茶呢？寶玉的全部生活力量，都祇集中在兒女之情的上面。其生活力量所活動的範圍，雖甚狹小，然其意識的本質，則可謂尖銳化之極了。讀者雖不免怨他懶用情，却不能不愛他情重，故一旦跟着他領悟到他所領悟的情空，五衷何能不有所失？

漫談到這裏，對於「生」的觀念，我們可以有一個相當的結論了。我覺得所謂「生」就是由靈性發生意識，由意識發生感情的「情」的內在的活動與發揚於外面及於一個對象的活動現象。一個人的生活力的強弱，全在乎這「情」本質的濃淡與這活動範圍的寬狹。若是他的「情」本質相當濃厚，就是活動的範圍比較狹小，亦不愧為一個生活着的人。假使他的「情」，本質既然異常濃厚，而活動於外的範圍又來得極其寬廣，那他自己所感受的生命當然豐富而其表現於外的生活方式也必一定如文天祥，岳武穆，諸葛孔明等那種真可一世的熱烈與芬芳了。反而言之，如果一個人的「情」本質原來就是十分暗淡，而活動的範圍又窄小得甚至於只限於自

己一身的那種自私自利上面，那種人，雖然有生的形狀，其實只是站在生命的零點上面，早晚就會被自己的冷氣凍凍了的！但是有的人外表看起來生活力似乎是極其雄厚，而其實祇是假糊塗。譬如，歷史上的王莽及袁世凱就是顯然的例子。這兩個人都是能力十分充足氣魄相當浩大的。然而終不受國人的愛戴而被稱為亂臣賊子與民族罪人的緣故，就是他們的「情」的本質雖是熱烈，而「用情」的範圍過於狹隘。他們全部生活的努力完全集中在個人權勢的擴大與鞏固而非如真正的偉人，如美國的林肯，我國的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畢生堅苦卓絕的目標是全民族全人類的幸福。真偉人與假糊塗的分別就在這「情」的純潔與污濁上面。所以我覺得一個人的性格偉大或卑鄙，不在其地位的高低，權勢的大小，錢財的多寡，身世的貴賤，而在其「情」的本質的熱烈或暗淡，純潔或污濁，及其「用情」的範圍的廣遠或狹窄。

偉大人格的表现，常以兩種方式出之：一以行動，一以言論。以行動出之者，歐美有華盛頓，林肯，貞德女英雄，我國則歷史上有的是忠臣義士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之流，近代則有先總理孫中山先生，及當前的蔣委員長。凡屬能以行動來表現偉大的人物，環境雖然有相當的影響，但其靈性的高尚，意識的銳利，感情的熱烈，總言之，生活力的強盛，必定特有與人不同之處。至於以言論表現偉大的人物，多半以境遇之不許，不能在行動上表達其人格，而又不能逆制其內心生活中的感情的澎湃而不得不借文字來發揮其對於或是身世，或是家國，或是社會，或是種教的感情。所以我

們有如劉鐵雲所謂離騷，莊子，史記，草堂詩集，李後主之詞，八大山人之畫，西廂與紅樓夢等不以哭泣為哭泣的偉大感情的流露。

以行動出之也好，以言論出之也好，凡是能表現偉大人格的人，一定可稱為生活着的人，反之，則雖有生的外表，却祇不過行尸走肉而已。所以西洋人有一句名言：與其昏昏沉沉無聊的過一世，莫若在光榮中轟轟烈烈的生一時。西洋人之所以有勇敢冒險，進取，堅強的精神，這種人生哲學恐怕也有相當的關係。因之，我覺得所謂「生」並不在時日的長短，壽命的高天，而在於對於生命的意識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強烈或暗淡，充實或缺乏，積極或漠然。譬如，我們現在前方作戰的青年，在那愛同胞愛國家愛民族的狂熱情緒中過的日子，雖然也許短暫得祇是一年半載，却比在後方那些牌酒終年，專為私人利益鑽營地位的行尸走肉比較起來，實在是更有生與死，存與亡的分別。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也就是說：一個人心死了，就等於整個人死了，我們就可以對他表示哀悼。所以我們後方這些沉湎於煙酒賭博懶惰驕淫的人實在是死人，而這三年來為國犧牲的壯士，軀體雖然毀滅了，却始終活躍的生存着，因為他們的心始終未死；在那短短的生活過程中，在內心方面，他們對於生命有過與奮強烈積極飽滿的意識，而發揚於外及於我全民族這種廣大的對象中又留下了驚天地與日月爭光的烈蹟。在我們這與天地長存的民族大生命中，他們的忠魂是永遠永遠的生存着！

我對於「死」的瞭解是許多歲月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在法國讀書。在暑假中約了幾個朋友去遊以花馳名的尼斯(Nice)，順便也就去參觀了附近小王國蒙拉哥(Monaco)的有名賭場蒙加羅(Mt Carlo)。在那金碧輝煌，豪華絕世的賭宮中一門巨室內十來個男女正圍着一張大圓桌作輪盤賭。在那闊無人聲，陰氣襲骨的氛圍中，那些男女正如羣魅出世般，手持長柄木把，目不轉睛的注視着輪盤的轉動。一時，輪盤停住了，大家舉起木把，鼻孔裏發出種種吼聲，如怒犬相鬥的，祇將賭金向自己身邊把；把了之後，又斟酌注金，再往掉上擺；擺了之後，又睜不旋轉的凝視着輪盤的轉動；輪盤又一時停住了，又舉起木把，祇向身邊把……如此者繼續不斷的動作着，動作的機械可謂入了神入了化！那些男女一點不像有生命的人，而是一些木偶，缺乏靈魂似的，在表演什麼。也許是整個氛圍的關係，也許是他們面上表情的原因，也許是他們動作與鬥舞的節奏的影響，當時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聖西安(Saint Saens)的名曲；魔鬼舞蹈(Dance macabre)。他們好像在那兒具體的表演這音樂裏面的情節，那個倉白面孔，披黑髮，着黑衣而眸子又黑得如午夜那末寂寞的女子似乎是這幽舞的主角。在當時，好似一顆巨大的黑石，從天門頂上，落在我的意識的清池內，把我的全部意識的清流震動了，放出一圈圈一圈圈凌冰冰的漣紋，向我全部性靈奔馳，直使我整個身心感覺「死」的意義。從那時起，我就瞭解「死」並不是軀殼的毀滅，而是「心死」，「神死」，「靈魂之死」而已！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草於嘉定武大

編輯後記

周子亞先生在「論中國外交政策」一文的後半部裏，對今後中國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條最可能的路線，及與走這條路線有關的三個問題。周先生這篇文章是近年來討論中國外交政策的許多文章中很平實中正的一篇。

沈昌煥先生是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沈先生根據他在美國時和華僑廣大的接觸的經驗，寫了這篇「沒有國書的使節」；希望有關各方面都能一讀這一篇文字。

許汝社先生用清新的文筆寫國際關係，在最近國內許多寫這方面的文字作家中，另具一種作風。

本期集稿時，恰巧日本內閣改組，所以我們特約金長佑先生寫了一篇「論米內內閣」；他這篇文章寫得十分扼要正確。我們另外請楊玉清先生寫了一篇「日本現勢論」，就整個日本的國情，作一次分析與展望。金楊兩先生都旅日極久，金先生現任時興潮社編輯，關於日本問題的著作，有「日本政府」(商務大學叢書)等書；楊先生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關於日本問題的著作，今有「日本政治之(今昔)商務」等書。又因為美日商約已於一月二十六日廢止，我又請郭斌佳們先生寫了一篇「美日交涉中的幾個要點」。郭先生現任China Forum 主筆。

袁昌英先生現任國立武漢大學教授。袁先生是中國文藝界的前輩，近年來她很少發表文字。這篇「漫談生死」是一篇極富哲理的散文，寫得非常精細。

(編者)